

蘇曼殊、張大千、小僧我

鈕先銘

——三個逃禪和尚的際遇

小僧本是日本成語，直譯為小和尚、伙計或佣人，是一句可愛的謙卑語。用來形容我鈕先銘自己也許恰到好處；可是與曼殊、大千兩位大師排排坐，則未免妄自尊大；但我們三個人却都是逃禪入俗的和尚。

曼殊大師小謫人間

前歲為曼殊大師百年忌，洛城詩會以詩會友兼祝其冥壽，小僧我也參加了盛會。大師生於一八八四年，在此百年間，正是我中華民族一大艱辛考驗，大師是生得其時，同時也是生於憂患。先於大師三十年前，正值太平天國之變，清廷衰落，而外侮頻增。

一八七二年強鄰帝俄侵伊犁；一八七四年日本出兵臺灣；一八八七年英軍進迫九龍，一八九〇年復侵入西藏。日本更乘虛而起，一八九四至一八九五年甲午之戰，我方敗北，真所謂內憂外患，罄竹難書。

大師生逢其時，感時憂國，坎坷一生。一九一八年仲夏竟染時疫而涅槃，天妒英才，小謫人間，享年僅三十有五，為舉國所同哀！大師似乎

早有先機預兆，所以他有一首詩識：

人間花草太匆匆，春未殘時花已空。
自是神仙淪小謫，不須惆悵憶芳容。

這正和金剛經上一首偈一株：

若以色見我，以聲音求我。

是人行邪道，不能見如來。（如來是真理）

小沙彌時即具智慧

大師生於江戶，隨母河合氏適僑商蘇傑生，蘇為香山望族，視大師如己出，可惜不幸早歿。大師當然不容於中國式家庭，所以幼年就外傳於香港，從西班牙籍羅彌莊湘先生習英文，先生也很器重之。當其時乃母也被迫返回日本，大師幼心冀落，憤而落髮於廣州長壽寺。這是他接受到梵典的伊始，乃十二歲之小沙彌也，而却種下慧根！

稍長，母召依親，就沒有再當和尚，而入了上野美術學校，旋又轉早稻田大學習政治。據一九二七年柳亞子及令息无忌所編的蘇曼殊全集中所附的新傳，述之為並無所得。但我的看法略異，這五年間正值大師弱冠之年，也是人生對於學

習和培養之最寶貴時期，奠定了大師在文學、藝術方面的基礎。

以大師半生行狀觀，其交往者均為一時俊秀，如章太炎、章士釗、陳獨秀、葉楚傖、邵元沖、劉半農等。我對上述人士並不以爾後之成就論之，是以諸先生之文章丰采而心嚮往之。大師之所以熱愛中華，很受到上述諸名士之影響。

一九〇〇年庚子，八國聯軍侵華，大師又受到衝擊，而入了陸軍學堂凡八閱月。但他的老師莊湘深知其徒的性格，與其欲學軍事以救國，不如仍學梵典以救世，所以資助他赴泰國，學梵文於喬悉摩長老。莊湘老師本為西籍人士，應為天主教徒，而卒資助其學梵典，固然因為學問範疇應永無止境，不分國界，同時也可說「知徒莫若師」也。

他留泰僅一年餘，而能主講於曼谷青年學會，這是絕頂的聰明所致，同時也開拓了他教學的生涯。一年後他轉學於錫蘭島，即今之斯里蘭卡。此島本是佛滅後五百年第四次結集佛典之處，用的是巴利文，這是佛教南傳的總站。

一九〇五年大師二十二歲，開始編著梵文典

，並主講過「祇園精舍」；此處是佛世時駐錫最多次的廟宇，位於恒河北岸而靠近山麓，也是佛祖教學的廟堂。釋迦與孔子同時，都是一生以教學為主旨，用潛移默化來改進社會。曼殊大師在中華文化方面是師孔子，而在佛學上則皈依釋迦。他對佛學的進修，可喻之為三級跳遠：以泰國為起步，以錫蘭為踏石，而後進入印度求法，再往上溯當然是基於小沙彌時代的慧根。

大師遺作七點質疑

曼殊大師去印度是循「海上經路」而去的，這是鄭和七次下西洋的典範。由於時代的進步，大師進修學理也較法顯、玄奘兩法師來得廣泛，又有語文的天才，綜合英、泰、巴利文和中文譯經，不像舊式的學佛者專鑽一部大藏經死啃。惜天不假年，英年早逝，未能完成他的抱負，而遺作又那樣喪逸。幸有知己柳亞子先生喬梓，在其歿後整理了他的遺作。他認識亞子先生是一九一〇年二十七歲時，在短短的十二年間結成了永恆的莫逆之交。現在小僧就憑亞子先生所整理的遺作中來敘述一點拜讀的心得。

第一、大師好寫作而不做帶自珍，信手拈來而信手散失，亞子先生喬梓所能搜集的遺作，其所佔之比例如何？固無法統計，同時必尚有未完成之稿殺青。

第二、小僧最欣賞曼殊大師的小詩，清新脫俗，有晚唐之風，豔者超過西崑，壯者不遜於劍南；且不事雕琢，頗承盛唐之傳統（僅遺七八十首）。

第三、其次是他的書簡集，雖簡短而有熱情，且表達了他的生活與個性，亞子先生為其寫傳記大都以此為線索（僅遺一百三四十封）。

第四、小說僅六七部，代表作固為「斷鴻零雁記」，都是以他自己作為主人翁，或以個人的幻想而予以結構。以現代比較文學而論，不算上乘，但以當時之作品而言，亦可說頗欲突破新文學之先河。

第五、綜合其作品，多屬於散文小品形態，這是頗受南傳佛典雜阿含經之影響。大師曾求典於錫蘭；雜阿含經本為釋迦一生之支爪片鱗，大師之遺作亦類似之。

第六、大師對於日文的造詣極深，固不待言，即以其漢詩而觀，亦頗受日本漢詩之傳統影響；因為他是有日本漢學的底子而來學中文的，時年正在二十歲左右。

日本對他的佛學更有莫大之影響。據柳亞子編撰的蘇曼殊新傳：「……偶檢故篋，得日本僧飛錫所為潮音跋，……」足證大師與日本僧侶有深厚的交往。北傳佛教固由中國、百濟（韓國）而日本，但青出於藍，有以正之。在漢文學上也一樣，朱舜水（一六〇〇—一六八三）在水戶黃門拓開了朱子學派的「水戶學」，已奠定了日本漢學的基石，這不可說是青出於藍，只不過是乞鄰而與之而已。明治（一八五二—一九一三）維新，東洋的漢學加上西洋文明與科技，這是日本的盛朝，曼殊大師真是趕上時代了！

在東西文化的交流，漢、佛學的融合之際，我想提出兩位日本的代表人物：一位是夏目漱石

（一八六七—一九一六），另一位是鈴木大拙（一八七〇—一九六六）。我為什麼特別檢這兩位來說呢？因為他們與曼殊大師是同時代的人物，可謂師友之間，都長大師約十歲，與漢、佛、東、西文學的交流，都有密切的關係。

夏目漱石其一本傑作的書，題名為「門」；這個「門」字是由禪學上「無門之門」而來的。夏目並沒有當過和尚，但有心學禪而不得其「門」入室，才寫了這本書來表達其心性。小說中主人翁名宗助，拜門於鎌倉圓覺寺的洪嶽宗演禪師，但此門雖入而不能登廟堂，最後演成了在家修行的「居士禪」，夏目即以宗助為替身而來說法。我不知道大師讀過夏目的這本小說沒有，但却為大師和小僧作了強烈的寫照。鈴木大拙是日本禪學上的祭酒，學貫東西，周遊南傳的佛教國家，固不論曼殊大師是否直接讀過上述兩位大士的作品，但至少會受到兩位的影響，因為那時候是日本學術文化的狂飆時代。

第七、大師雖不幸短命死矣，但對於「無門之門」似乎是隨意出入，以大乘的居士禪而普渡衆生於世。靈骨葬於西子湖畔的孤山，此為當年南社成員所供養者。不意時隔四十載，為紅衛兵所破壞。大陸諸冤多獲平反，不知為曼殊大師重建靈塔否？哀哀惜哉！

以上七點擬實疑於柳无忌先生，无忌與家姐為印大的同仁，經此管道請益，无忌先生當可直教無諱。

小僧與大師似有緣

挑燈夜讀大師詩文

大師長小僧一代，雖然無緣識荆，即以其遺作，我在少年時亦未嘗拜讀。一九二八年我隨家兄一班同學共同留日，彼時正值北伐前後革命高潮，目的均在於投考日本陸軍士官學校，以期爾後參加抗日救國的陣營。我爲了惡補日文，遂經崔萬秋學長之指導就讀於廣島。在吃原子彈以前，廣島僅爲日本之三等都市，中國學生不多，生活較廉，宜於進修。此時就在萬秋書齋中，我才發現曼殊大師的詩文集，挑燈夜讀，不忍釋手。也因爲萬秋是學歷史與文學，更引導我進入了文學的園地，啓發了我的抗日意念。

翌年我雖然也考入士官，而且掛榜畢業，但我對日本的文學反而喜愛於軍事學之上。一九三一年七月返國省親，兩個月後就發生九一八事變，粉碎了繼續赴日深造的計劃。由於父執輩的世交，我應傳作義將軍之召，服務於塞北。因爲我祖先是隨忽必烈來到中土，所以我對蒙古有一種潛意識的嚮往。就在大陰山下結識了一位畏友謝承瑞先生，承瑞和鄧小平是同時留法的勤工儉學生，鄧一頭鑽進共產主義，而謝則鑽進了書堆中。謝畢業於德國柏林大學數學系及法國高級兵工學院，爲了實習，又入過楓丹柏綠砲兵專校，爾後成就爲我國軍中學人。歸國後曾在國立中央大學教授流體力學，此爲發展航空及爾後火箭之基本課目。我在軍中結識之後，在「老西兒」部隊中因只有我們兩人是去自南方，所以軍中稱我們是「兩個蠻子」，並不加以排擠而是表示溺愛的

綽號，我們對於傳將軍的部隊確實獻許多現代化的改革工作。承瑞覺得我的軍事學還不够深入，士官本只是一所初級的軍校，因之促成了我再度出國赴法深造，這可以說是影響了我作軍人的半生。

七七抗戰軍興，我奉召返國，分發在全名中央軍校教導總隊，這是當時唯一的現代化輕裝師團，只缺乏坦克與重砲。在淞滬戰場上八字橋也發揮相當的效力，守南京時已是傷殘過半的部隊。敵因在上海不得其逞，遂自金山衛登陸直攻南京，指向東南角的光華門爲攻擊重點。

守軍是謝承瑞一個步兵團和我一營工兵，敵軍曾數次穿入而却被我們逐退。在戰場間隙期間，敵轉移了方向，從南邊的雨花臺切入城中，正攻擊到我們的右側面。謝團被殲，承瑞忠貞殉職，我則僅以身免，匿居在鷓鳴寺做了八個月的和尚。

鷓鳴寺中幻覺化身

就在寺中殘留的亂書堆中，我又發現了一本曼殊大師的遺作；這次再度拜讀，不僅了解更深，而且我簡直幻覺我是大師的化身。說也奇怪，大師與鷓鳴寺並不是毫無淵源的，他於戊申正月自日本致劉三的箋札上說：「前者偕足下登鷓鳴寺觀臺城後湖之圖，並懷人之作三十餘幅，均待鏤入銅板，然後一一寄呈故人耳。……」可見大師曾以袈裟之身，爲鷓鳴寺作畫，焉得不教我幻覺爲三十二相之大師化身？

敵軍曾屢次來寺嚴查，並以戰刀置於小僧頭

項，而我從未作日語以乞賤命，此乃出之於謝承瑞殉國的沖擊。我不曾與承瑞共死，已覺慚愧萬分，何肯以日語乞生而作漢奸焉！

當然曼殊大師對小僧學佛的影響，更爲重要。爾後我也寫了一本「釋迦牟尼新傳」拙作，雖係粗淺的學佛入門，但除臺北商務正版外，却有兩個盜印版本，足證下里巴人其和者衆。

百日和尚大千居士

談到大千先生的故事與曼殊大師又迥然不同。先生身本富家，又具有藝術天才，他之所以出家爲僧者，完全是向現實反抗，是歌德「少年維特的煩惱」，也是六〇年代嬉皮心理的作祟。

尊翁爲蜀中之企業家，曾將各項關係企業分配於家族子弟，迫使先生赴日深造紡染，擬塑成財閥門第的成員。先生人天交戰，以出家來作無言的抗議，當然也受到愛情的挫折。可是他當了「百日和尚」後，在即將受戒的前夕，深悟「具足戒」是戒、定、慧三真諦之一，何可能以「燒戒疤」來代表佛法的宏揚？就毅然反俗，以在家僧的姿態來堅定他對佛學的信心。其一生傳奇的經歷，爲舉國所詳悉，用不着小僧來拾人牙慧。

獻身精研佛教藝術

大千先生誓以一生的精力，以其對藝術的天才，決心於佛教藝術的精研，而開拓了對敦煌石窟探討的途徑。

敦煌！是多麼響亮的一個地理名稱。自春秋戰國時起，北疆即有匈奴爲患，燕、趙、秦築長

城以禦之。漢武帝雄才大略，以外交、軍事雙管齊下，先後派張騫等作探討與聯絡工作。爲了擴張軍備，設河西四郡：武威、張掖、酒泉、敦煌，以作爲補給、兵站、屯田各項基地，最高目的是取得大宛的汗血馬，來組成類似今日的快速坦克部隊。這條路在秦漢都稱爲西域之道，已有三千年的歷史。史記所載起之於周穆王時代，當時還不知可以一直通到地中海。

英文中有個專用地理名詞 *Eurasia*，是一個合成語，意譯爲「歐亞大陸」是一脈相連的。十九世紀德國大地理學家李希特和芬 (Richard F. Hirth) 在其著作中爲此道取了一個洋名——絲綢路；日本的大作家井上靖加了一個字名之「絲綢之路」，更順口些，乃不脛而走。似乎都太着重於經濟價值，但從佛學家人士看來，又須增加一層宗教色彩，因爲所謂佛「經」，這個「經」字當然是套用中文經、史、子、集的「經」字。可是梵文中「修多羅」這樣一個音譯的專用佛學術語，在印度稱「線」爲修多羅，是連貫在一起的意義，因之佛教人士用絲路之「絲」和修多羅之「線」混合的使用，以連接另兩個地理專用名詞——沙漠綠洲 (oasis) 和沙漠市集 (Caravan)，這是希臘文轉過來的。

絲線之路實在是歷史太久而時代太長，兼之民族太複雜，宗教太排斥，假設不多嘮叨幾句，則知者固嫌囉嗦，而不知者則如墜五里霧中。最簡單的解釋：自從漢武帝開拓四郡以來，敦煌變成了瀚海中的中途島，文化、貿易、宗教、軍事的中繼站。它開闢了自四世紀北魏而終止於十二

世紀的北宋，在此八九百年間，幾乎與舊譯新譯佛典的時間相平行，而構成中華文化的同化與泛濫。這種簡易的說明，實不可少的，但與本文的主題無關，小僧正在撰寫「絲路漫步」一篇拙作，以期爾後再度請益於諸公。

本文的主題是要寫大千先生對於敦煌整理的抱負與貢獻。

先是穆罕默德創造新宗教——伊斯蘭教，主張硬性的政教合一，狂飈掃蕩了非洲、印尼和中國東、絲路沿線，使敦煌塵封了七八百年之久。可是敦煌在明、清兩朝均有安撫的政策，自不若匈奴當年爲患之苦，兼之地方統治者也陽奉陰違的臣服北京的朝廷，表面上是相安無事。而實際上則尚有外來的覬覦，帝俄之來自北方，英國之經由西藏，都有打入新疆的企圖。當然內部還有宗族、民族之內在衝突，所以有些寶貴的文物就被有心的方外人士，密封於十七號洞中。到了一九〇〇年前後，才被道士王圓籙發現，也不過視爲是一種古董而已，根本不認清其文化價值。真正認明的反而是一批洋人，如代表印度方面的斯坦因 (Aurel Stein 一八六二——一九四三)、法國的伯希和 (Paul Pelliot 一八七八——一九四五)、日本的大谷 (政治和尚)，還有其他德國、瑞典的探險家，都是些知識份子，雖然他們未必能明瞭那些文物的內涵，但有學識的基礎，知道這是無價的文化寶藏。

他們蒙蔽清廷官吏的昏庸，以金錢的利誘，自王圓籙道士的手中，巧取豪奪，共取去十萬件以上。在運往出國的途中，還在當年的北京開了

一次展覽會，以誇示他們豐富的所獲，才引起了中國學者羅振玉、王國維等的注意，爾後又有胡適、劉復等繼之，還加上一位陳寅恪教授。以上各位文士都是世界性的學者，便將敦煌文化的研究命名爲「敦煌學」，成爲學術上的專用名詞。

苦行心情敦煌面壁

敦煌學分兩大派系：一派是主張對編號十七洞的文件，精研細嚼，以補償唐宋以來文化遺產的遺漏；一派是擴大地區性包括吐魯番、新疆等的石窟文化，甚至於連全國各地所有的石窟都列入研究範圍之內。這本是可以平行並茂的，因爲各人所指向科目不同，像大千大師就是以佛像、雕塑、壁畫爲專門對象。

大千大師於一九四一年初率其子姪學生及工作技術人員十餘名，其中有專門人才兩位喇嘛，一行溯嘉陵江經廣元千佛岩，再經由天水的麥積山而到達敦煌的莫高窟。攜帶器材達六、七十驢車，空運重要物品四百五十公斤。

大千先生是蜀中的望族，有地靈的因緣，兼其文學、藝術、宗教的修養和地方人士與政府的協助，時值太平洋尚未開戰，中國全民正處在獨力抗日的苦戰之中，先生深感責任重大，生恐有負衆望，所以才先探測廣元、麥積山，以明瞭石窟的構架。並儘量搜集劉復在巴黎倫敦所抄回的卷子和拍攝的三千餘片膠片，以及北大編成的「敦煌石室經卷中未入藏經論述目錄」(清末李灼通所整理)。

大千大師攜帶了各項資料於一九四一年初啓

程赴敦煌，連續工作了三十一個月，我稱之為「大千大師的苦行」時期。苦行是佛教術語，涵意甚多，包括尋師、問道、煉獄、方技；大師是抱着苦行心情而去的。他在莫高窟羣中（共存三九四窟），修補了二百多件壁畫與塑像，臨摹了二十餘幅形象完整的壁畫，寄運到成都展出。每幅長約一丈五六尺（中國尺），寬度在兩丈左右，四週用直徑三五寸木棒為框，不僅逼真，而可亂真，震撼中外，為舉世所欽（抗日勝利後又在各地展覽過）。

迨大陸再度陷入戰亂之期，人們各奔東西，大師亦曾飄泊於巴西與加州甚久。臺灣安定，始攜眷返國定居，命其邸宅為摩耶精舍，是借佛母之名以盡赤子之心。他曾編印了三本畫集，題名為「敦煌臨摹白描畫」，可說是他敦煌之行的「豐工偉集」，工者工筆白描，集者為「結集」敦煌藝術專科之專目。小僧近年亦移居海外，又對藝術原屬外行，自無從進修，但願能於海外遺珠中尋求點滴而已。

茲略列如次：

(一)美國 賓州大學附屬美術館中藏有「昭陵六駿」中兩件浮雕；「拳毛騶」和「颯露紫」；據說為華商所贈，實為二十年代自中土所軼去。其次在波士頓，浩白特大學福格美術館東方部主任魏納博士，在一九二三年於莫高窟中第三二九窟「西方淨土變」壁畫上偷剝A B兩片，魏納所偷剝的共十一件，塑像一件。

(二)德國 第二次大戰前柏林國立美術館印度部有克林威德爾 (Grunwedel 一八五六一一九

三五) 在南疆四次探險所奪的成果：壁畫、塑像、文書多件，在二次大戰中分三處保存，大件頭因無法移動，頗多損害，三處保存者，戰後移歸新館。

(三)英國 倫敦大英博物館和大英圖書館有斯坦因所奪取共二百餘件壁畫、塑像、經典、變文及官制文書；彼死於一九三四年，迄今五十餘載，全部資料尚未整理完畢，足證數量之多。

(四)法國 巴黎琪美美術館有伯希和所竊的敦煌壁畫，文書類則保存於國立圖書館。

其次與羅浮博物館齊名的愛美達修美術館所收的是研究「西夏學」的殿堂。

(五)瑞典的海丁 (Hedin 一八六五—一九五二) 曾四次探險找邊城——目黃河沿岸以達新疆，著有「絲路」一巨冊，小僧近日購得再讀，覺其資料陳舊，已非今日可用。

以上各點均為今日研究敦煌之人士可供參考

者。洋人巧取掠奪，固屬可惡；但 Senarati 有名言：

「較藝術品本身更為重要的是它播下的種子；藝術會沒落，畫作會湮沒，要緊是那所播的種子。」

這倒不是自我阿Q，而是事實。

本文原係散文式的戲作，勉強將曼殊大師、大千大師和小僧拉在一起，因為我們三人真都是在家僧的優婆塞。三個和尚中以曼殊大師最有仙骨，大千大師最有成就，小僧只是攀龍附鳳而已！因此我集了曼殊的小詩中一首集句，作為尾聲：

九年面壁成空相，獨向遺編弔拜倫。
我亦艱難多病日，尚留微命作詩僧。

附註 拜倫 (Byron 一七八八—一八二四)

英國爵士詩人，為曼殊大師最崇尚者，大師譯過拜倫三首名詩 ①去國行 ②大海 ③哀希臘

中外雜誌 國外讀者服務部簡則

(一)服務事項：1.代購國內出版書籍，代預約即將出版之書刊。2.代訂雜誌。3.代印文件。4.其他有關文化服務事項。(二)代購書刊按臺幣售價計算郵費等按實際支付結帳。(三)歡迎海外讀者設立帳戶，凡以支票存本社美金壹佰元或港幣伍佰元即可開設帳戶，每半年按往來帳目結算一次。(四)在本社設有帳戶之讀者購買本社書刊，一律按定價八折優待。(五)來函及匯款請寄臺北市龍江路一〇八號中外雜誌社收，英文通訊處為：KALEIDOSCOPE MONTHLY

108 Lung-kiang RD.

TAIPEI, TAIWAN, REP. OF CHINA